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库

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

1927—1937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 张静如

仝阵之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

1927—1937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首席专家 张静如

开阵之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 : 1927 ~ 1937 / 亓阵之著. —
北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6

(中国共产党辉煌 90 年)

ISBN 978 - 7 - 5300 - 0324 - 4

I. ①土… II. ①亓…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1927 ~ 1937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594 号

中国共产党辉煌 90 年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 1927—1937

TUDI GEMING RU HUO RU TU 1927—1937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首席专家 张静如

亓阵之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5 印张 269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0 - 0324 - 4

定价: 4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文库》

编 委 会

主 任 傅 华 史秋秋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力 史秋秋 曲 仲 刘陈德 李翠玲

张静如 陈之昌 姚 桓 崔新建 傅 华

总 前 言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90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90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90年，是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90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策划、组织、编写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库》，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和《90年中人与事》三个系列，共18种作品近700万字。《文库》旨在从党史、党建和奋斗中的共产党人三种不同视角，反映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文库》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点出版物。

为做好《文库》的组织编写工作，确保《文库》及时、高质量地出版，成立了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傅华和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史秋秋为主任的《文库》编委会。编委会组建伊始，就对《文库》的编写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和学术规范，强调书稿撰写要有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基本史实、基本观点准确，既要体现近年来研究的新材料、新进展，又要有新视角、新观点，以确保《文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知识性，将《文库》打造成精品。《文库》的编写组织工作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我们聘请了党史、党建领域的著名学者张静如、姚桓、刘陈德分别担任《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90年中人与事》的首席专家，负责对具体选题、作者队伍、内容框架以及时间进度把关，并负责最后统稿、定稿等工作。这三位首席专家既是组织者，又是作者中的一员。他们尽职尽责，不辞辛

苦，付出了大量心血。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或工作之余，认真研究，勤奋写作，保证了书稿的按时交付。《文库》或许还未臻完美，但确是作者潜心研究和深入思考的成果。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对《文库》的编辑出版高度重视，给予了指导和支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办公室不仅具体承担了《文库》的策划、组织、统筹协调等日常工作，还为《文库》的撰写和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北京出版集团领导和该集团人文社科图书出版事业部的编辑团队，为《文库》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在《文库》即将付梓之际，我们对上述单位的同志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期望《文库》能够为党史知识和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普及发挥应有的作用，期待广大读者对《文库》给予批评指正。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文库》编委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目 录

第一章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1
一、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1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5
三、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8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2
一、八七会议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	12
二、南昌起义	15
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
四、广州起义	22
五、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	23
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整顿和恢复	27
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的开展	27
二、党组织的初步恢复和发展	28
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30
第四章 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35
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35
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会剿”斗争	38
三、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41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43
一、中共六大的筹备	43

二、中共六大的召开	45
三、中共六大的意义及缺陷	48
第六章 中共六大后革命运动的复兴	50
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开展	50
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54
三、古田会议制定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	62
四、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	66
五、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70
第七章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73
一、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	73
二、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76
三、开展土地革命的意义	79
第八章 “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	82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82
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统治的开始	88
三、左翼文化运动	94
第九章 红军反“围剿”的斗争	97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97
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	102
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	105
四、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	106
五、红军各方面的建设和作战原则的基本形成	108
第十章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12
一、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112
二、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115
三、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120
第十一章 “左”倾冒险主义的贯彻	125
一、“左”倾错误对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危害	125

二、红军继续反“围剿”斗争及局部失利·····	130
三、“左”倾冒险主义在根据地的贯彻·····	132
四、川陕、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36
第十二章 革命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	139
一、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39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141
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44
四、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46
五、根据地党的建设·····	147
第十三章 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150
一、根据地的查田运动·····	150
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52
第十四章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157
一、红十、红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的转移行动·····	157
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60
三、遵义会议——伟大的历史转折·····	163
四、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165
五、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	171
六、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和西路军的英勇斗争·····	173
七、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178
第十五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83
一、华北事变和民族危机的加深·····	183
二、《八一宣言》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187
三、瓦窑堡会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192
四、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	197
五、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转变·····	199
六、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202
七、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208
八、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212

第十六章 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努力·····	219
一、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	219
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	222
三、总结经验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224

第一章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一、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民党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变成一个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这时，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桂系和粤系军阀在南京、广东和广西等地有着相当的势力。已参加国民党的地方军阀阎锡山仍然割据山西，冯玉祥则占据陕西、河南和陇海铁路一带。奉系军阀张作霖没有参加国民党，盘踞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

国民党各派系为争夺最高权力互相争斗，以致兵戎相见。南京的蒋介石在1927年8月受桂系排挤，一度“下野”，但他的嫡系军队仍控制着江浙一带。10月，宁（李宗仁、何应钦）汉（汪精卫、唐生智）之战爆发，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战争。不久，武汉方面战败，汪精卫又依托广东的地方势力成立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对抗。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拉拢汪精卫，排斥桂系势力。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机构，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职务。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四大派系由于对奉系军阀作战的需要达成暂时的妥协，他们的军队分别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开始继续所谓“北伐”，夺取奉系军阀所占据的地盘，于6月占领天津和北京（随即将北京改名为北平）。6月初，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弃守北京，乘火车退往山海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决意抛弃张作霖、另行成立“满蒙帝国”计划的一部分。1928年年底，张作霖之子、新任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没有顺从日本使东北独立的意图，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但这种统一是表面的、暂时的，很快又为新的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所代替。实际上，两广、四川、西北和东北各地方军阀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分裂割据，并不断地和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开对抗以致发生战争。正如1928年10月毛泽东所分析的：“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①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争夺。1927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量已经超过战前的水平，贸易额已经接近战前水平。但是这个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发展非常迅速。这样，各国都不满意经过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确立起来的势力范围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都力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因此，各国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日益尖锐，而中国则成为美、日、英三国相互间激烈争夺的焦点。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趋势和购买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即将爆发。这一时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逐渐法西斯化，扩充军备，镇压国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为确保在中国的利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扶植国民党中央政权，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另一方面又采用分裂剥削政策，在各地扶植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政权相对抗，制造中国的分裂和内战，以便控制中国。

蒋介石是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上台的，当他向革命人民挥舞屠刀时，帝国主义也成了他的后盾。因此，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彻底放弃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7—48页。

了孙中山反帝、联俄的主张，代之以亲帝、反苏的对外政策。1928年4月，南京政府向上年3月制造炮轰南京事件的英、美等国表示歉意，赔偿损失，并“惩办凶手”，下令通缉在南京领导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产党员林伯渠。1928年5月3日，日本军队制造屠杀数千名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南京政府卑躬屈节地顺从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下令国民党军队不准抵抗，任凭日军缴械，并下令保护日本人。与此种态度相反，南京政府却于1927年12月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枪杀副领事等十多人，同时驱赶苏联驻中国其他城市的领事。1929年5月，南京政府又指使东北地方当局派军警包围并搜查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逮捕和监禁苏联领事及有关人员。7月，东北地方当局在南京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破坏1924年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的协定，以武力强行接管中东铁路，解除苏方人员的职务，引起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挑起中东路事件。12月，中国军队失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中东路7月以前状态。

南京政府建立后，从1928年6月起，曾大力宣传要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发起一场同外国列强“改订新约”的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也对南京政府作出一些形式上的让步，如同意“国家关税自主之原则”等。但是，修订新约的内容仅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在“关税自主”方面，从7月开始，南京政府先后同美、意、英、法、日等国缔结关于关税问题的新条约，从1929年至1934年，先后四次修订税则，使海关税率有所提高。实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只是答应提高一点关税，中国政府在制定海关税率时仍然要受这些国家的约束，仍无权自定关税，而且中国的海关行政权仍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南京政府虽在同旧条约期满的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等国订立的新约中，规定取消领事裁判权，但又规定须待其他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半数以上放弃特权时，方可废除。随后，这个问题因受英、法、美、日等国的阻挠而不了了之。“改订新约”运动虽然废除了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享有的特权，但实际上不可能从根本上扼制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增长。

这个时期，美、英等国对南京政府作出一些让步，是因为它们要求在中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统治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实际上，它们对中国的侵略是更加深入了。在对华投资方面，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已从战前的22.557亿美元，增加到34.8765亿美元。其中英国投资增加近60%，美国投资增加近2倍，而日本的资本更增加了4.5倍。在对华商品输出方面，1927年中国人超为9431万海关两，1932年增加到5.566亿海关两。1927年以后，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增多。在产业方面，1931年，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下的机械采煤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总产量的69.1%，生铁产量占全国生

铁总产量的 97.2%；在华外国工厂纱锭数占中外厂纱锭总数的 43.5%，布机数占中外厂布机总数的 51.4%。在交通方面，1930 年，航行于中国境内的外国船舶吨位数占中外船舶吨位总数的 82.8%；1931 年，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控制的铁路里程数占全国铁路里程总数的 84.3%^①。在金融方面，据 1933 年的调查，149 家华商银行的实收资本仅有 2.67 多亿元，而英国在华的汇丰、麦利加、有利、大英 4 家银行的总资本就达 1.1 亿多美元。当时全国华商银行存款不过 30 亿元，而美国在华的花旗银行的存款就达 13 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性更大了。

南京政府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因此，蒋介石集团上台后，建立起一套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制度。

城市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其中，江苏、浙江地区的财阀先是支持蒋介石上台和建立南京政府，继而以捐款、贷款和承购公债等方式，帮助这个政权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中央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超经济的榨取和掠夺，把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逐渐成为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国民党统治集团还把建立和垄断金融机构作为主要手段，对全国的经济命脉实行控制。1928 年 11 月，南京政府设立中央银行，给予它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国币、经营内外债等特权。其后，又成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并通过强行修改条例、加入官股、强行改组等措施，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中国当时最大的银行，以及各地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二等银行，还把“中华邮政储蓄汇业局”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加以控制。

农村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柱。南京政府建立后，许多地主充当了国民党的官吏，许多国民党官吏成了新兴的地主。据国民党江苏民政厅 1928 年至 1934 年之间的统计，该省拥有 1000 亩土地以上的大地主共 374 个，其中有 77 个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吏^②。这种状况，决定了南京政府必然维护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这个政府虽然宣布要实行“二五减租”，如 1930 年 6 月公布的《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地租从未因此而有所减少，有些地方甚至还不断增加。国民党政府还通过实施严密的保甲制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24、128、134、190、222 页。

^② 王效文等著：《中国土地问题》（下），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120 页。

度强化在农村的统治。1931年，国民党的“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拟定了保甲制度和保甲法规，并于同年6月在江西全省试行，以后逐步扩大到各省市。

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借口中国人民缺少政治训练，实行独裁统治，建立起一套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制度。

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训政”。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国民党“独负全责”。这样，国民党完全剥夺了全国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1931年5月，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在国民会议开幕词中，蒋介石公开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此后，国民党组织其党徒和御用文人，通过舆论工具掀起一场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狂热。蒋介石还多次组织考察团去德国、意大利考察，派人前往受训，并聘请一批德国法西斯分子担任政府顾问。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所期望的改善，而且很快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城市中，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极为悲惨。1928年，上海各业工人的工资大量减少。武汉工人的工资能维持1927年水平的，只有1/5。广州建筑工人的工资由每日0.95元减至0.7元，油业工人的工资被降了3次。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日益加大，一般都恢复到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纺织厂工人更是由每天工作12个小时增至16个小时，一个工人由管理一两部机器增加到管理三四部机器。

农村中，豪绅地主向农民实行反攻倒算，减租减息变为加租加息，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苛捐杂税也越来越重，如江苏省的田赋附加税超过正税的5倍乃至26倍。人民缴纳的租税，90%左右被用作军费，连各种水利专款、赈济款项也被挪用。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

上兵荒马乱以及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给农村带来无穷苦难。农业生产日益萎缩，经济凋敝，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据南京政府的官方统计，1928年，全国受灾地区达21省，共1093个县外加4个市，灾民的人数据极不完全的报告，有5662万多人，1929年增加到7000万人。1930年，受灾县达517个，灾民2100万人以上，其中“陕甘灾尤重，居民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裂啗死尸，易食生人”。1931年又遭受严重水灾，湖南、安徽、湖北、河南、江苏、江西等16省的灾民至少在5000万人以上，全国死于灾荒者达370万人。据南京政府赈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仅江淮流域被淹死者就达26.5万人。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批失学失业，且毫无民主权利。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所负担的捐税也大大加重，据记载，1931年在安徽、江苏、湖北、浙江等省所征收的营业税，超过1925年的3倍乃至11倍，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更无法计算，迫使他们一天天地走向破产。

在南京政府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实行关税自主、废除厘金等措施，加上白银价格下降，刺激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减少了外国商品的进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曾一度有所发展。据中国银行1930年度营业报告统计，卷烟、棉织、制帽、制皂、化妆、造纸、机器、针织、调味品、搪瓷、橡胶等11个行业，1929年度的总营业额为1.2亿元，1930年度平均增长20%，营业额增加2400万元。再据中国银行1931年度营业报告统计，1931年上述各行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橡胶业1930年增长率为250%，1931年增长率为200%；棉织业1930年增长率为120%，1931年增长率为128%；卷烟业1930年增长率为130%，1931年增长率为115%^①。但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经济侵略并未减弱，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首先，民族资本在资金、设备、技术方面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其次，民族资本的资金也不如买办资本雄厚，不如买办资本能得到外国的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保护。最后，在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农民购买力极低和国内商品市场萎缩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更是难以获得发展。此外，南京政府还千方百计向民族资本家进行勒索，如采取高压手段向他们推销公债，开征新税，采用绑架等恐怖手段或以其他罪名逼迫“捐款”和缴纳“赎金”等，使他们常常陷于困境。

从南京政府建立到九一八事变发生这段时间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

^① 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59、61页。

然有某些发展，但是发展的速度愈来愈缓慢，有些行业甚至出现急剧衰退的现象，无论是工厂数还是资本额都日趋缩小。从历年注册的材料看，1928年注册的工厂有250家，到1931年只有113家，比1928年减少54.8%；每家工厂的平均资本额1928年为47.1万元，到1931年只有24.5万元，比1928年减少48%^①。再从纺织业纱锭数量和布机数量的增减中也可以看出民族资本和在华外资相比较，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从纱锭数量来看，1930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14万余枚，在华日资工厂则增加纱锭40万~50万枚；1931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6万余枚，在华日资工厂则增加10万余枚。1927年，民族资本工厂的纱锭数占全国纱锭总数的57.4%，1931年便降为56.5%，如果除去名义上是华商经营而实际上因借贷关系被外国所控制的纱锭数，真正在华商手中的纱锭数仅占全国纱锭总数的44.1%。从布机数量来看，1930年全国新增加布机3180台，但属于民族资本工厂的只有513台，占全部新增布机的16.1%。这一时期，停工和减产也成为民族工业的普遍现象。根据对上海97家丝厂的调查，1930年停工的有65家，失业工人达31500人^②。其他民族工业如面粉、卷烟、火柴、皮毛等，也逐渐陷入风雨飘摇的困境中。

在这种状况下，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出的情况是复杂的。其中一部分人在大革命高潮时，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同时又由于当时工人运动中存在“左”的过火行为，而退出革命阵营。由于国民党曾是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蒋介石等人在背叛革命后仍然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曾对南京政府做过某些表面上的让步，一时造成国民党政权似乎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假象；加上当时形式上形成的国内统一的局面，并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采取了个别有力的措施，这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产生过在国民党政权之下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但事实上，这种希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国民党在建立和巩固政权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财政上的支持，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拉拢和利用。一旦国民党政权稍加稳定时，便产生一种新的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进行限制。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其中个别代表人物虽然参加了南京政府，但并不能起多大作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阶级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同国民党政权的裂痕日渐扩大。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

① 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1951年第12期。

② 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1951年第12期。